

第 16 辑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编辑部编

# 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

第十六辑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编辑部编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责任编辑：郑厚安

责任校对：刘佐汉

封面设计：王 鹿

版式设计：王丹丹

## 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

Guowai Zhongguo Jindaishi Yanjiu

第十六辑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  
发 行

经 销 处

太阳宫印刷厂印刷

---

850×1168毫米 32开本 8.875印张 1折页223千字

1990年10月第1版 1990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500册

ISBN 7-5004-0793-9/K·99 定价：4.55元

## 目 录

---

|                         |                      |
|-------------------------|----------------------|
| 中国东北的红胡子·····           | 马克·曼考尔, 乔治斯·吉达柯夫 (1) |
|                         | 麦志强译                 |
| 满洲的区域开发·····            | 罗纳德·苏勒斯基 (12)        |
|                         | 王学良译                 |
| 战后国民政府统治时期的             |                      |
| 中国东北地区经济·····           | 山本有造 (24)            |
|                         | 刘晶辉译 赵连泰校            |
| 孙文与满洲问题·····            | 藤井昇三 (48)            |
|                         | 李吉奎译 马宁校             |
| 中国人民的领袖孙中山              |                      |
| 永垂不朽·····               | 吴永清译 (59)            |
| 宋教仁和同盟会资料·····          | 迟云飞译注 (66)           |
| 黄兴同俄国驻汉口领事馆秘            |                      |
| 书沃兹涅先斯基的谈话·····         | 严昌洪 朱福枝译 (75)        |
|                         | 张贯益校                 |
| 邓演达与国民党理论体系中            |                      |
| 的民众革命思想·····            | J·肯尼思·奥林尼克 (94)      |
|                         | 郭根山译 丁则勤校            |
| 1913—1914年的沙皇俄国与蒙古····· | 黄鸿钊译 (132)           |
|                         | 郑厚安 康右铭校             |
| 关于俄共(布)华人分部代表           |                      |
| 与中共组织的联系问题·····         | A·И·卡尔图诺娃 (160)      |
|                         | 郭兴仁译                 |

20—40年代中国共产党内思想斗争的

社会前提和社会基础..... A.B. 潘佐夫 (166)

郭兴仁译

中国革命的任务和对取消

派的斗争..... 卡尔·拉狄克 (185)

吴永清译

大革命时期的中国共产党

与国民党..... 杰柳辛 科斯佳耶娃 (198)

曾宪权译

国外对五卅运动的研究..... 董进泉 王建华 谈春兰 (237)

# 中国东北的红胡子

马克·曼考尔

乔治斯·吉达柯夫

红胡子的起源——白马张的13条帮规——热尔图加共和国的政治结构 and 经济状况——欧洲人对共和国的看法——红胡子的特点

阿穆尔河（即黑龙江——译者）流域到19世纪中叶已经成了介于俄国西伯利亚和中华帝国东北地区的边境地带，从拓殖这个地带的最初日子起，北满的居民就由不同的社会群体混合组成。有些社群得到官方支持或批准，作为移民定居下来，另一些社群则对北满的自然资源从事非法开采或干打家劫舍的勾当。起初，无论是否获得官方批准的社群，基本上都是由俄国人组成。然而到19世纪中叶以后，特别是清朝为了开发经济和抵御俄人不断扩大的领土蚕食，而把前此一直对汉人封闭的满洲正式对汉民开放以后，北满的上述两类汉民迅速增加。在中国其他地方专指贼帮的“红胡子”，成了所有未经清朝官方批准而在北满落户谋生的汉人的通称。虽然在各帮红胡子当中偶尔会有俄国人、蒙古人和满族人，但他们基本上是山东和直隶两省移居满洲的移民。<sup>①</sup>

在地域分布上，红胡子差不多遍布满洲的大部分地区，面积几达两个法国之大。在东部，乌苏里江流域和山区<sup>②</sup>都有他们的

① 索科夫宁上校：《满洲的红胡子》，载《军事文集》，1903年第12期，第195页。

② 关于这个地区的红胡子，参看纳达罗夫：《在南乌苏里边境的红胡子》，载《军事文集》，1896年第9期，第183—204页。

踪迹；在西北部，他们活跃在远至额尔古纳河和阿穆尔河上游，在北部，他们集中在阿穆尔河一条支流热尔图加(Zheltuga)河周围，和在阿穆尔河沿岸的漠河地区；在中满，尽人皆知他们分布在中东铁路沿线。他们并不把活动范围局限于交通要道、森林和乡村。诸如盛京（沈阳）、吉林、大连和旅顺等主要居民点，都受到过红胡子的攻击，或者曾经在此时或彼时成了他们的活动中心。我们无法精确断定红胡子的活动始于何时，但早在1866年就知道有红胡子帮攻掠城池，而晚至本世纪30年代，还有红胡子帮在推动抗日游击活动。<sup>①</sup>

最著名的红胡子帮活跃在19世纪60年代兴起的北满金矿区。依照大清律，下层土和土中之物皆属帝产，因此，北满的金矿业由朝廷开发和管辖。金矿工作条件十分原始，且由腐败无能的官僚维持着这种状态。结果，招募来做工的华北农民都逃亡了，朝廷发觉无法再找到自愿来的农民顶替，就转而利用流放的犯人和“反社会”分子来充当劳动力。但这些人也很快弃矿而逃。有些逃亡的人私自采金，于是犯了逃亡和偷窃双重罪过；另一些人则当了强盗。大多数红胡子就是这两类人。还有另一种人，特别是那些首领人物，则由清朝官员构成，他们或因种种原因遭贬谪来北满，或因逃避内地的追查。最后，还有些西伯利亚人、蒙古人和朝鲜人，不过他们的人数总是很少。<sup>②</sup>

在历史文献和报刊文章中，通常用“贼帮”这个普通名称来称呼红胡子，很容易掩盖了他们极不相同的社会来源。例如，在一帮红胡子的成员中，包括有：一个破产的商人，因欠债而被官府逮捕，买通了看守逃出来；一个其父因与红胡子有来往而遭到官府残酷杀害的人；一个被人行骗而破产的农民；一个在偷窃时杀了人的人；一个木匠，因在家乡受不了压迫而逃亡；一个中东

① 前引索科夫宁文，第196页；让·谢诺：《19、20世纪中国的秘密会党》，（安阿伯，1971）第43页。

② 弗朗西斯·米里：《在满洲和红胡子在一起的一个月》，载《世界旅行》，1912年4月第18期第183页。

铁路的工人，追求铁路当局不允许的个人自由；一个自华南逃亡出来的爱国的国民党分子，因为反清，官府悬赏5000两银子收买他的头颅。<sup>①</sup>这使人想起中国著名的“反贼”小说《水浒传》中不同的角色。可以想象得到，这帮人和其他类似的社群，所干的远远不止是打家劫舍的勾当。日、俄和中国的企业、官府和臣民都是红胡子的目标，正是这个事实不可避免地给他们的活动带上了政治色彩。<sup>②</sup>

这种政治性质，在约束一个红胡子帮的13条帮规里明白地表现出来，13条帮规是由人称白马张<sup>③</sup>的这个帮的首领制订出来的。新入帮的人最少得有20个帮中兄弟介绍。要成为帮里正式的成员，就要公开宣布愿意接受首领的领导，通过由首领主持的一个帮仪式，并且参加一次出征行动来证明自己是合格的成员。

帮规要求帮中人在需要时要援助其他伙伴，要保守帮内机密，要执行分派的任务，还要行为正直。帮中任何人如果有（帮中认为的）反社会行为，就要遭到严厉惩处。显然，白马张帮中人并不认为自己是强盗。

帮规更进一步把从事专门职业的人分成两类：其职业能为社会所接受和不为社会所接受。前者在入帮以后仍可继续操业，后者特别是算命占卜的人，则遭到禁止。此外，帮中人若迷于此类“寄生职业”者，不能担负领导工作。这一点是认真对待的，从一条帮规就可以清楚看出来：被公推出来而不能履行领导职责者处死。

帮规还区分谁是帮里认为当然的敌人和劫掠对象，谁则应当受到保护。老人妇孺和单身旅客不在攻击之列。官吏和官府的差役，不论清廉贪墨，只要通过该帮势力范围，都是当然的攻击

① 鲁多科波夫：《红胡子》，载《历史公报》，1910年6月号，第923—954页，特别见第933—941页。

② 前引谢诺书，第132—134页。

③ 孤航：《红胡子的生活观》，载《东方杂志》1927年7月，第24卷，第13期第73—77页。

对象。不过，贪官则夺其全部财帛，而有好名声的清官则只夺其财帛之半。另一类名义上不受攻击的是外国人，他们甚至还会被“慎加”保护，以免与订约大国发生纠纷。这一条如果存在过，看来也不过是仅仅属于礼节性而已。<sup>①</sup>在行动时侮辱妇女要处死；缴获归己而不归公也要处死。

白马张的帮规搞了两套促进帮内团结合作的方法。一是认同程式：一种特别的吸烟方法使红胡子帮成员彼此可以认同，一旦身分明确以后，任何红胡子，有义务提供帮内另一个人要求的一切援助；二是恪守对帮的忠诚高于私人关系的规定。违反帮规者得由帮内人抽签来执行处决。抽中者如不执行任务，本人就要被处死，即使要处决的是他的骨肉至亲也不例外。

帮内每次行动所得都要平均分成九份：两份归公以备各种需要；一份给为这次行动通风报信的人；四份由帮内各人分摊，一份由参加行动的人分配；一份由因公伤亡者的家属分配——一种原始的社会保险制度。

通过这13条帮规，显然红胡子（或者至少是其中的一个帮）不仅仅在他们本身与帮外人之间划出了明确的界限，而且在帮内树立了某种社会和道德价值作为行为准则来施行。此外，他们自认为是“应运而生”的一个帮，这一点可以从他们补充和增加成员的仪式上和他们以钱物抚卹因公伤亡人员的家属上清楚地看出来。虽然这些性质看起来是原始的，但表明了这是一种超越了中国普通贼帮所具有的那种观念的“红胡子观念”。<sup>②</sup>

这种红胡子观念，即意识到自己有别于仅仅是中国社会的法外之人，在所谓的热尔图加共和国（Zheltuga Republic）的历史上得到了最清楚的表现。这个热尔图加国，是在19世纪末叶在北满沿热尔图加河金矿区建立起来的，一个高度自觉和具有原始性

<sup>①</sup> 雷华德：《和中国贼帮在一起的十星期》，伦敦，1927。

<sup>②</sup> 白马张的帮规以摘要形式首次于1927年发表。这些帮规可能是在热尔图加共和国灭亡后制订的。

的共产主义社会。在上一世纪与本世纪之交到满洲的欧洲旅行者，特别是那些具有空想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思想的人，把热尔图加国看做是他们的信念正确的证明，他们相信社会主义社会或无政府主义社会是合乎自然规律的，而且因为热尔图加国的发展看来并没有受过西方的政治或思想影响，更足以证明这一点。正如亚历山大·乌拉尔（Alexandre Ular）评论说：

“这些可以让人描写成反社会、跟斐济的食人种族差不多的人，他们的工作和生活方式叫人想起让一雅克（卢梭）视为理想的制度……说实在的，共和国是由严格执行一面威吓、一面掌握经济条件的两手策略而发展起来的。但是应当注意到，那里找不到一个欧洲社会主义者所描写的不快乐的人，这种人认为有权离开一种社会秩序而到他认为更好的另一种社会秩序中去。相反，共和国公民是活跃的人，勇敢地起来反抗社会，解放自己（是包含各种不同意义的“解放”），并且自愿成为自行运转的机器里的一个齿轮。”<sup>①</sup>

虽然我们并不确切知道热尔图加共和国建立的日期，<sup>②</sup>但它显然是同流动性更大的红胡子帮同时兴盛起来的，也是对同样社会状况作出的反应。迫使逃亡的矿工订约结成原始的合作社群的是两种状况：需要在一个个人极难独自存活地区生存下去；需要共同防卫以反抗中国官府和对付新到矿工要求入伙的压力，这些新到的人如果入伙，就会耗去他们的资源而无法继续生活下去。

有大约2.5万人口<sup>③</sup>（绝大多数是男性）的共和国必须创立

① 亚历山大·乌拉尔：《满洲被放逐者的共产主义史诗》，载《白色杂志》，1910年202页。

② 前引米里文，第186页。

③ 据米里的说法，热尔图加共和国在1865年建立，那时已有三四千居民。他说，到1880年，人口超过2万。（见乌拉尔文，203页，）但从未超过2.5万人。

一种社会组织来向它的公民——被原有国家政权排除在外的法外之徒——提供某种行政服务，同时与周围的居民达成某种临时协议。热尔图加红胡子虽然比外面的红胡子帮人多势众，武器更精良，但他们力图避免冲突；因为冲突不可避免会引起中国和俄国当局的注意。因此，共和国的首领开始跟周围的红胡子谈判，在热尔图加西部很远的松花江河源附近建立一个定居点。

由于缺乏粮食，气候恶劣和有吃人的野兽出没，使松花江流域的金矿未被开发。但看来显然只要有一支武装和给养齐备的人马就能够建立起一个农业和商业组织，足以提供生活必需品。因此，共和国作为对周围红胡子帮允诺不加干犯的回报，答应派出到松花江金矿区的向导，并提供六个月的给养，使这些人马能够在那里建立一个定居地。第二个矿工共和国在松花江上游适时地建立起来，并且显然日益兴旺。它效法第一个矿工共和国，但人口少得多。正如亚历山大·乌拉尔所说：

“确实异乎寻常的是，两个集团之间生死攸关的对立从未导致公开战争，即使在初创时期也如此。没有什么比这些罪犯——或者象那些无知的人所称的堕民——的富有活力的逻辑更卓越、更令人钦佩了。这些人在这个严格地非此即彼的时代里懂得思考。”<sup>①</sup>

热尔图加共和国的制度大部分建立在两个原则上：普遍选举和一种绝对共产主义。其立法权由一个民选的30人议会行使，议会的工作就是制定国家的总政策。<sup>②</sup>然后由议会任命一个执行委员会，执行委员会有两名主席，两名法官，一名管供应的官员、一名管生产的官员和一名管贸易的官员。

两名法官负责执行一部严厉的法典，但他们执行时要和地区

<sup>①</sup> 前引乌拉尔文，第202页。

<sup>②</sup> 同上，第203页；米里文，第188页。

委员会商议，跟法国的仲裁法庭（conseils de prud'hommes）相似。杀人者处死；打人者处体罚，有许多其他种种不法行为者驱逐出境，而在北满那种严酷的环境下，驱逐就跟处死差不多。值得注意的是偷窃也要处死，据乌拉尔说，这是因为偷窃违背了国家本身的根本性质。

管供应的官员是经济部长，他负责农业、渔业和运输，以及粮食的贮备和分配。粮食集中在国家仓库里。管生产的官员监督国家的金矿业、基础工业及其他国家收入的主要来源，特别注意国家的技术发展。贸易官员负责国家的对外贸易，也即在中国和西伯利亚出售他们的黄金产品。他是个相当重要的人物，能对西伯利亚和中国的地方当局施加影响，因为这些地方官自己往往私下对共和国的黄金买卖感到兴趣。<sup>①</sup>共和国的整个政府机构，还包括一支约200人的武装警察部队，这些警察由生产官员统率。<sup>②</sup>

共产主义原则主要在分配方面发挥作用。大众从事采金、耕作、运输和其他职业。担任行政工作的人由地区委员会选出。全体共和国公民，从金矿工人到两位政务过繁的主席的收入都一样。此外，作为防止人民通过储蓄积累财富的预防措施，所有支付都使用每年年底结算一次的信用券。这样一来，由于每个人都可以随意使用自己的信用券，没有人能在社会经济上比别人优越。

旧物显然可以在公开市场上交换，但是新商品，不论是国内生产的还是由出售黄金从外地购买的，只能在公营商店出售。对外贸易出现盈余就存在国库，定期以国家年度信用券方式在全民中分配。这些信用券既不能用黄金也不能用外币兑换，因此没有人可以把钱财带出这个社群。乌拉尔报道说，由于清朝官府对共和国的暴力镇压，这些财富不可能全部分给大众，以防落到清朝官员手上。

---

① 前引乌拉尔文，第204页。

② 前引米里文，第189页。

共和国严格的经济共产主义对社会生活方面也起作用。由于妇女相对稀少，她们大都从事农业和渔业，在公民地位和社会活动方面与男人完全平等。据法兰西斯·米里（Francis Mury）说，有些妇女是自愿入伙，其余是被红胡子在她们的家乡抢来的。那些被抢来的虽然是共和国自由平等的一员，却不许脱离这个国家。自由恋爱是这里的惯例，没有家庭法也没有婚姻法。结婚并非大事，既不用举行什么仪式，国家行政当局也不介入。因为至今还未弄清楚某种原因，孩子非常稀少。显然有单一男性家庭存在，乌拉尔说道：“一般认为，由于在普通中国人当中，同性恋关系仅仅是对正常两性关系的补充，男人有没有女人共同生活，都同样能够过得很好。”<sup>①</sup>

米里宣称，共和国的共产主义严格得不近人情：

“这些法外之徒生活在普通人类社会之外，面对着接踵而来的艰危厄困，在他们当中没有人能逃避劳动才能生存的法则。同情和怜悯是谁都不懂的感情，一个人因病或遭到意外而失去劳动力的话，休想得到别人的帮助。如果他有远见，留起一些作为这个联盟的工资的信用券的话（金子只能用作跟外部世界交换的手段），他也许可以休养几个月。即使这样，他赋闲时间也不能超过一定限度，因为信用券从发行之日起一年后结算，到期未曾支用，其所值由国库收回……。病人没有积蓄工资，或者信用券已经花完的话，知道没有人会提供帮助，只能在自己的小屋子里等死。怕遭到同样命运的同伴不敢帮助他们。”<sup>②</sup>

尽管米里对共和国生活无情的一面感到惋惜，他却不由自主对这种生活羡慕得感到嫉妒。他在1912年写道：

---

① 前引乌拉尔文，205页。

② 前引米里文，第186页。

“这个联盟是迄今实施过的最奇妙的共产主义试验。由于它组织得完美而简单，尽管坚持严酷对待个人，或者正因为如此，它达到了异乎寻常的兴旺发达。我们欧洲的集体主义者们，能在这个小小的共和国作短暂逗留的话，无疑会学到许多东西。他们会注意到，每个公民都尽其所能为国效力，在一切财产共有的环境下，共产主义决不会损害社会来迁就个人的怠惰。”①

约11年以前，乌拉尔在1901年甚至更热情、更富同情心地写道：

“这个从无到有的共和国，开展了一项集体主义的试验，其规模远较欧洲的社会主义者——甚至是那些移居国外并或多或少掌握了科学理论的人——迄今所能进行的试验大得多。它在一片不毛之地，在据说是致命的恶劣条件下，没有外援而取得了相当的繁荣和令人惊奇的经济的发展，从一开始就证明了仍然不为欧洲人所知的一种不可思议的天才创造力，这种创造力甚至最缺乏教养的中国人都具有，他们自己组织起来，为他们自愿效忠的组织效力。共和国简单的立法，干练的政府，以及最令人感兴趣的、对公共财产的管理，看来确实证明了，只要有数量严格限制的人口和最低限度的必要的立法和政府机构，共产主义能够最大限度地发展生产同时又能为它的每个公民提供最大限度的安全保障。

因为热尔图加那些亡命之徒的生活条件是那样的原始，他们的经验跟欧洲的社会主义理论沾不上边。然而，最低限度看到了一群人类社会最悲惨的成员，白手起家创造了一个卓有成效的社会，不能不令人感到鼓舞。从科学观点来说，

① 同上。

这个自发的社会主义试验中心的毁灭，令人感到无比的痛惜”<sup>①</sup>

热尔图加共和国在19世纪60年代建立起来，到1883年开始繁盛，<sup>②</sup>并一直延续到两个世纪更替之后一段短短的时间为止。那时候它的领土对建筑中东铁路的俄国变得重要起来，而它的影响的扩大，终于惊动了清廷。北京政府获悉当地许多清朝官员只是遵照红胡子的旨意出巡和办事以后，终于决定采取果断行动。俄国当局封锁了西伯利亚，截断了红胡子可能的退路，清朝军队得到这种合作，很快就打散了共和国的保卫者。许多红胡子遭到杀害，其余的（也许多达半数）逃到松花江共和国，还有一些参加了已有的或自行组织的帮会。<sup>③</sup>

白马张的13条和沿着热尔图加河建立起来的国家组织雏形有两个共同特征。首先，两者都在清朝社会的边缘地带。热尔图加共和国和它在松花江的兄弟国名副其实地处于清朝军队、政权和法律管辖范围之外；白马张帮和类似的帮会虽然是在清朝政府政治边界之内活动，却置身于中国社会正常的法律和社会组织之外。流动的红胡子帮跟中国内地的秘密会社大致相象，他们的人帮规矩，他们的行动准则和他们维护对本帮忠诚的方式都相似。另一方面，热尔图加共和国则类似于在地理边缘地带建立了永久性社会的帮会，那些边缘地带无论是自然环境还是社会环境都是敌对的。

两个红胡子帮所共有的第二个特征，是他们明显的社会觉悟。由于没有传统社会形态，两者都建立了入帮规则，建立了获取和分配财富的制度，以及长期维持社群的方式。相信白马张可能受到从解体了的热尔图加共和国逃出来的红胡子的影响。但两个行

① 前引乌拉尔文，第203，205页。

② 前引米里文，第186页。

③ 热尔图加共和国灭亡的准确日期无法确定。这里所述来源于米里文第201—202页。

帮显然既没有受欧洲乌托帮社会主义的影响，看来也没有发展中国秘密会社所特有的那种政教合一的象征主义和开展象太平军那样的群众运动。红胡子那种原始平均主义看来是适应当时北满地区那种特殊环境而产生的，特别是适应经济边缘地区混杂居民那种法律上和地理上的孤立状态而产生的。热尔图加共和国和白马张帮从任何常规定义来说，都不是反抗中国社会的贼帮。两者都建立了一种法律和组织的雏形，跟他们的成员所脱离或被排除在外的那个社会的法律和组织相对应。他们的生活在经济上与清朝社会有联系，但在社会上和政治上则独立在其外。红胡子产生于对晚清不公正和无能状况的反对，但他们不仅仅停留在反抗上，而且进一步向前发展了。

译自让·谢诺编《1840至1950年中国的群众运动和秘密会党》，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72年版(Popular Movements and Secret Societies in China, 1840—1950. ed. by Jean Chesneaux, Stanford Univ. Pr. 1972) 第125至134页。

麦志强 译

## 满洲的区域开发

——本世纪20年代的移民劳动者与省官员

罗纳德·苏勒斯基<sup>①</sup>

本世纪上半期，一个大规模的人口运动终于改变了中国的经济地图。这个人口运动是汉族劳动者每年向称之为满洲的东北三省的移居。由于移民劳动的结果，到本世纪下半期，满洲成为中国农业最丰产工业最发达的地区之一。

汉族劳动者进入东北的大规模运动始于19世纪末，当时满洲被看作是一个具有会造福于国家的肥沃的待耕土地和丰富的自然资源的地区。由于满洲人烟稀少，人力成为开发该地区的无价之宝，于是清政府开始发布推动汉族人向满洲迁徙和鼓励他们开发该地区财富的法令。汉族劳动者进入满洲的运动在整个清朝末期历久不衰。清朝倒台之后，中国进入以国家政治和经济四分五裂、各地军阀割据和军费剧增为特点的军阀时期。在这一时期，对开发满洲经济的人力的需求如果不是大于清朝统治时期的话，也决不在其下，但是，极为缺乏中央政府的经济援助和行政指导。

在整个20世纪20年代，汉族劳动者川流不息地到达满洲，这部分地是由于他们为满洲有大量的工作和较高的工资所吸引。满洲的各省政府在没有得到中央政府援助的情况下，系统提出了由奉天省政府于1923年指导制订的具有广泛基础的《移民和开发计划》。该计划准备通过鼓励劳动者在满洲定居来改变他们的移民

<sup>①</sup> Ronald Suleski——密执安大学博士。本文是他1971——1974年在东京的研究成果。自1975年以来，他一直在阿林顿德克萨斯大学教授中国史，并任该校亚洲研究会主席。